中华军事五千年

古代军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奠定中华文明的涿鹿之战

距今 4600 多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爆发了一次对华夏文明走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涿鹿之战。

当时，我国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经过长期的部落冲突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夷三大集团。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和山西西南部一带的黄帝集团在与兴起于今河南西部的炎帝集团经过阪泉之战后逐渐融合，形成以黄帝为首的军事同盟。他们为赢得良好的生存空间，开始沿着黄河两岸向华北大平原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今山东南部一带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中的一支）也在其首领蚩尤的率领下由东向西发展，进入了华北大平原。这样，一场大战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相传蚩尤部落以剽悍善战、长于制造兵器而闻名。他们进入华北平原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冲突。结果，蚩尤在夸父部落和苗夷一部的帮助下，击败了炎帝部族，并占据了其居住的“九州”地区。炎帝不得已，只好向黄帝求助。黄帝出于维护整个华夏集团利益的需要，决定与炎帝联合起来，将势力推向东方。

冲突首先在黄河附近爆发。蚩尤部族集结了所属的 81 个支族，依仗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主动向华夏集团发动进攻。黄帝族则利用处于黄河上游的有利条件，筑坝蓄水，阻挡敌人的攻击。当时，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对长期生活在东方多雨地区的蚩尤族十分有利，而华夏族则明显不能适应。因此，作战初期，华夏集团“九战九败”，最终退到了今河北琢

鹿一带。不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黄帝抓住时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作战期间，突然狂风大作，尘沙满天，黄帝族乘势吹号角、击鼙鼓，利用蚩尤部迷乱之际，以指南车指引方向，向敌人发起猛攻，终于一战而胜，并在冀州之野擒杀蚩尤。战后，黄帝又率众东进，直到泰山附近，举行完“封泰山”的仪式后方才凯旋。为了进一步控制东方，黄帝选择了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领少皞清继续统治九夷部落，并强迫其与华夏集团结为同盟。

涿鹿之战奠定了华夏集团控制中原地区的基础，因而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华夏文明演进的奠基之举。此后，又爆发了禹伐三苗等“战争”，华夏集团的势力逐渐地向四方辐射，中华文明演进的基本趋势由此而奠定了基础。

成熟的战争形态—— 甘之战

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增多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明显，战争的性质也由原始的武装冲突逐渐向成熟形态的战争演化。甘之战便是这种演化趋势的最明显的标志。

禹作为华夏集团的首领，由于有治水之功和伐三苗作战的胜利，声望和权力倍增，王权思想逐渐萌芽。既然这种权力能够带来巨大的财富和享受，禹当然不愿意再实行传统的“禅让制”，轻易放弃本家族对联盟祭祀、行政和军事权力的控制。为了不遭到过于强烈的反对，他一方面在议事会上先后提名皋陶和伯益做自己的继承人选，另一方面又积极培植儿子启的势力，使他具有夺取权力的实力。禹的老谋深算终于如愿以偿。在他死后，启便杀死伯益，自任首领，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私有制国家—— 夏王朝。

然而，传统的惯性是巨大的。面对启这种石破天惊之举，旧传统、旧势力的代表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对新的社会秩序进行百般阻挠，并企图恢复原始的部落禅让制。甘之战便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在反对夏启的旧势力中，有扈氏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面对旧势力可能出现的联合，启决定拿有扈氏开刀，杀鸡儆猴。在夏启大军进发的同时，有扈氏也倾巢出动，准备与夏军决一死战。两军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相遇。

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启毕竟富有政治头脑和军事谋略。为了激发士气，他在战场上进行了战前动员，历数有扈氏的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恶，说明此次出征的目的和意义，并规定了战场纪律。这便是（尚书）中记载的《甘誓》。经过动员，夏军士气高涨，形成了克敌制胜的共识。作战伊始，夏军便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有扈氏的军队虽然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乱了阵脚，全线崩溃。夏启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全歼敌军，灭亡了有扈氏。

甘之战的胜利，是私有制对原始部落制的胜利，标志着“家天下”政治制度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战争形态已经成熟。

商汤灭夏，决战鸣条

夏启消灭有扈氏后，夏王朝的统治基本稳固下来。大约在400年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的暴君——桀登上了君主的宝座。这位末代君主骄奢淫逸，近奸远贤，对广大民众和属国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激起了普遍的憎恨和反抗。人们诅咒地说：“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强烈地表达了对夏王朝的反抗决心。夏桀的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而在这时，夏朝的属国商已悄然崛起，羽翼渐渐丰满。这个兴起于今河北南部、具有悠久历史的子姓部落，经过数代人的开拓，至天乙（即商汤）时，已经成溪足以与夏王朝相抗衡的强大方国。商汤是一位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领袖人物，他利用夏王朝残暴腐朽、丧失人心的大好时机，积极争取与国，得到了普遍的拥护和支持。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实力，商汤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并破格重用。后来成为商汤重要辅佐的伊尹便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因才华出众而被破格擢以为相的。伊尹为了解敌情，曾数次打入夏朝内部，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在军事上，商汤采取了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的方针，首先对周围的夏属国发动进攻，商汤的军队得到了人民的普遍支持，所到之处，百姓如“大旱之望甘霖”。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势力范围迅速扩大。灭夏的条件已渐趋成熟。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夏王朝的统治毕竟维持了400年之久，虽然已面临覆灭的命运，但在军事上毕竟还具有

强大的实力。为慎重起见，商汤采用了停止纳贡的方法来试探夏桀反应。夏桀果然大怒，立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见状，马上恢复了朝贡，暂时稳住了夏桀 。

不久之后，昏庸的夏桀因诛杀重臣而搞得众叛亲离。消息传来，商汤遂又一次停止向夏纳贡。这一次，夏桀的指挥棒失灵了。不但“九夷之师”不起，还出现了有缗氏的公开反抗行动。期待已久的灭夏良机终于来到了。

大约在公元前 1726 年左右，商汤举行了誓师仪式，便率战车 70 乘，能征惯战之士 6000 人，会同各盟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到西方，出其不意地向夏都发动进攻。尚处在醉生梦死之中的夏桀，闻报大惊。无奈之下，只好统率已被轻歌曼舞将战斗意志消磨殆尽的军队作最后的挣扎。两军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进行了一次生死决战。夏桀手下这些长期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们自然抵不住久经沙场、勇猛无比的商军将士，战不多久便纷纷溃逃。夏桀见大势已去，只好收拾残部，向东南方向逃窜。商汤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率领商军乘胜追击。夏桀屡遭重创后，仅率极少数人逃到了南巢（今安徽寿县南），不久便忧病而死。

伴随着夏王朝的覆灭，一个新兴的统治王朝——商王朝在铁血中诞生了。

喋血牧野，天下宗周

商朝建立后，经过盘庚迁都、武丁中兴等重大历史事件后，开始由盛转衰。大约在 600 年后，当帝辛（史称商封王）继位时，各种社会矛盾已空前激化，各地反商势力此消彼长、此起彼伏，使商王朝穷于应付。

其中，反抗最强烈、最有影响的是生活在江淮之间的东夷各部族。他们在商王武乙期间便开始向西扩展，严重地威胁着商朝的统治。为了稳定政权，商朝不得不进行东征。在与东夷的作战中，商军虽多次获胜，但东夷的反抗并未消弭，而是以另一种更具策略性的形式继续着。当商大军压境时，则化整为零，采取袭扰的办法与之巧妙周旋，商军一去则卷土重来，攻掠东方各商属国。就这样，商朝的东征陷入了持久战，致使国力耗尽，民怨四起。而以封王为首的商朝奴隶主贵族非但不恤民力，反而更加残暴。

整个商王朝已处在行将覆灭的边缘。

封王年幼时，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又力大无穷，英勇善战。但他的聪明才智却并没有用来治国安邦，实现商朝的中兴，相反地，却成了他追求享乐的手段。对于享乐，他有着无限的欲望。一方面，遍集天下美女和珍玩，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大兴土木，荼毒民脂民膏。为修建鹿台，他不但大肆征调民夫，还规定：凡天下逃亡的奴隶和罪人，只要参加鹿台修筑便可免受处罚。这实质上否定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极大地损害了各属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对于

敢于劝谏的商朝贵族，封王则采取高压政策，制造酷刑，惨加迫害。这样，朝内朝外，一片怨声，而封王却安于享乐，对政事不闻不问。

就在商王朝日趋腐朽之际，生活在岐山脚下的周族则勃然兴起。这个以农业闻名的部族经过公刘、古公等几代首领的不懈开拓，至姬昌（即周文王）时，已赫然成为西方的一个强大方国。姬昌针对敌强我弱的现状，与其主要谋臣姜尚制订了韬光养晦、秘密发展、兴周灭商的战略方针。姬昌继位后，通过入商朝贡、贿赂商朝宠臣等手段，赢得了商王的信任。

在商朝的支持下，周相继征伐西北方的戎狄部落，消除了东进的后顾之忧。在此基础上，姬昌修明政治，广纳贤良，还对商王朝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和“外交”攻势：请求封王废除“炮烙”酷刑，争取人心；调解虞、芮两国的土地纠纷，颁布“有亡荒阅（即搜捕逃亡者）”的法令，以争取与国，使周的影响日益扩大。接着，又利用封王付与的征伐之权，由近及远，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黎、邗等国，最后集中力量消灭了商朝在西方的重要属国——崇，打开了通向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的道路。在此期间，姬昌通过率诸侯朝觐，卑事封王；同时，“列侍女，撞钟击鼓”，做出贪图享乐的样子等一系列手段，巧妙地达到了迷惑封王的目的，保障了剪商事业的顺利进行。

到了姬昌晚年，周的影响已扩大到江淮流域，处在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境地。灭商的条件已渐趋成熟。

文王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武王在文王剪商的基础上，加紧了灭商的准备工作。这时，商封王已感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并曾打算对周用兵。但这一计划很快便因东夷再叛而化为泡影。当商军主力再次陷入东方战场后，武王联

合各路诸侯，东渡黄河，在孟津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史称“孟津观兵”。据说，当时有八百诸侯“不期而至”。这种说法虽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已足以说明周在各诸侯国影响之大了。为慎重起见，武王没有立即兴兵伐商，而是在观兵后率众西还，继续等待时机。

两年后，商王朝内部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王叔比干因进谏被剖心处死；封王的庶兄微子启愤然出走，不知去向；另一位重臣箕子则佯狂被囚。商王朝已是众叛亲离，亡在旦夕了。武王闻报，果断地做出了伐商的决策。

大约在公元前 1057 年正月，周武王亲率兵车 300 乘，虎贲 3000 人，甲士 45000 人，会同各路诸侯的军队，浩浩荡荡地杀入商朝的腹心地区，拉开了灭商作战的序幕。

消息传到朝歌，商朝上下十分惊慌。由于商军主力尚在东征战场，远水难解近渴，封王不得已，只好将大批奴隶和战俘武装起来，连同留守朝歌的军队共 17 万人，由他本人率领去迎战周军。

二月初五，两军在朝歌西南的牧野摆开战场。清晨，周与诸侯联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武王历数商封王的种种罪行，以激励将士的斗志。接着，申明保持战斗队形的具体要求和不准杀降俘的战场纪律。这便是有名的《牧誓》。誓师完毕，姜尚便率一部分精锐部队向商军发起猛烈攻击。被封王强迫来参战的奴隶和战俘早已恨透了封王及其帮凶，这时纷纷倒戈，为周军开路。武王见状，立即指挥大军，展开全面进攻。商军在周军的猛烈冲杀下，丢盔弃甲，伤亡惨重， 17 万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封王见大势已去，率残兵败将逃回朝歌，当晚便自焚于鹿台，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鹿台的熊熊大火，宣告了商朝的灭亡和西周的诞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牧野之战后，武王又分兵出击，肃清商朝的残余势力和散布各地的商属诸侯，基本上控制了原商属地区，成为天下共主。

两年之后，武王便因积劳成疾，撒手西归。年仅 14 岁的太子姬诵登上王位，是为周成王，而武王的同母弟姬旦（即周公）便担负起教育和辅佐成王的重任。这时，发生了封王之子武庚与管、蔡、霍三国的联合叛乱。由于这三国的国君都是武王的弟弟，被派来执行监视武庚的任务，故史书上又将这次叛乱称作“三监之乱”。危急关头，周公镇定自若，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采取断然措施，经过 3 年的时间，终于平息了叛乱。此后，他制礼作乐，规定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的所有人的行为规范；又协助成王封邦建国，屏障西周。通过这些措施，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社会生产也因此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进入了全盛发展的阶段，于是便出现了历史上所谓的“成康之治”。

骊山烽火灭宗周

社会历史总是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西周经过一个时期的繁荣后，由于阶级矛盾激化、内部离心力加剧以及从未消除的戎狄之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至昭王、穆王时已出现了中衰的端倪。昭王南征的失败和穆王穷兵黩武、连年西征戎狄的恶果，使周王朝国势衰微，影响减弱。共王、懿王、孝王、夷王之时，周朝虽然勉强维持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但对外用兵则负多胜少。厉王继位后，一方面连年用兵，空耗国力；另一方面又贪婪残暴，横征暴敛，终于引起了国内矛盾的激化，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国人暴动，极大地动摇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宣王时，周朝终于击退了周边少数民族咄咄逼人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重振了天朝的声势。但好景不长，宣王晚年时，周军在攻打太原戎、条戎、奔戎、姜戎时连吃败仗，至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就在这种风雨飘摇、亡征已现的时刻，昏庸无能的周幽王于公元前 781 年登上了王位。他任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等小人，竭尽搜刮盘剥之能事，对因地震、干旱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实施高压政策，致使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曾一度遭到抑制的戎狄也重新抬头，开始侵扰周室。整个周王朝已布满了“干柴”，大火随时都可能熊熊燃烧起来。而向干柴上投入火种的正是周幽王自己。

原来，幽王对一个名叫褒姒的妃子非常宠爱，为了博得她的欢心，曾不止一次地上演“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当时的

“烽火”，是军事上使用的一种警报信号，一旦燃起，就说明已经出现敌情，要求周围诸侯带兵勤王。可悲的是，在周幽王这里却成为玩乐的工具。当各路诸侯率领大军云集骊山脚下又带着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返回时，褒拟忍俊不禁，纵声大笑起来，幽王也从中得到了莫大的满足。“狼来了”的谎话重复多次后，人们便不会再相信了。然而，后来“狼”却真的来了。

幽王原本娶申国之女为后，并将其长子宜臼立为太子。现在，为进一步讨好褒姒，竟置“立嫡不立庶”的礼乐传统于不顾，废掉宜臼，改立褒拟之子伯服为太子。遭到众人反对后，幽王怕夜长梦多，又准备杀死宜臼，迫使其逃亡申国，投奔外祖父申侯。幽王杀子未成，又迁怒其母，干脆废掉申后，改立褒拟为后。这种公然违背“礼制”的行为，进一步激化了王室内部的矛盾。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 771 年），申侯为帮助外孙夺回王位继承权，串通缯侯，联合犬戎兵大举进犯周都镐京。周室西部的防御设施久已废弛，直接归王室统率的“西六师”也因长期生活腐化而丧失了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申侯与犬戎联兵很快便长驱直入，兵临城下。周幽王坐困愁城，只好将希望寄托在诸侯勤王上。然而，骊山的冲天烽火却未召来一支勤王之师。幽王无奈，只好令虢石父率兵作试探性进攻，以期侥幸获胜，振奋一下军心士气。可他哪里知道，虢石父只知借天子之名，到处作威作福，根本不懂用兵为何物；而镐京城的守军大多未经战阵，闻鼓而心惊。以无能之将率孱弱之师，而当雄猛之敌，其惨败便是可想而知的了。击败周师后，犬戎与申侯的军队攻入城中，到处烧杀抢掠，一座历时 280 余年的雄伟都城终于在烈火中化为一片焦土。

惊慌失措的周幽王和王后褒拟在司徒郑伯友等人的保护

下，乘夜突围而出，到骊山脚下再燃烽火，然而仍没有召来一支勤王之师，却因行动迟缓，被戎兵追上。结果，郑伯友在突围过程中被乱箭射死，幽王被捕杀于骊山脚下的戏水之畔，王后褒姒被俘。统治 200 余年的西周王朝至此宣告灭亡。

令王冠失色的繻葛之战

当镐京失陷、幽王被杀的消息传来后，各路诸侯方才明白，这次骊山烽火不再是游戏了。于是，卫、晋、郑、秦等国纷纷出兵，组成勤王联军，开抵镐京城下。几经血战，联军终于击败了犬戎，收复了饱受蹂躏的镐京城。长期流亡在申国的宜臼被拥立为王，是为周平王。鉴于镐京已毁于战火，无法立足，平王只好在各路诸侯的保护下，辗转来到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平王东迁”。这一年正好是公元前 770 年，春秋的历史至此拉开了序幕。

东迁后的周王朝，直接统治区域已很狭小，军力也不复如初，昔日笼罩在天下共主头上的彩色光环已黯然失色，周天子渐渐失去了驾驭四方的能力，不能像以往那样号令诸侯了。维持了 200 余年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伴随着周王朝的衰微而宣告结束，大动荡的岁月来临了。

“礼崩乐坏”的结果，使得诸侯中觊觎霸主地位的野心家纷纷破土而出，向周天子的权威提出挑战。郑庄公便是其中的“始作俑者”。

郑国立国虽晚，但其开国君主桓公是周厉王的幼子，由于与王室关系特殊，并在镐京之战和平王东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一直得到周王朝的倚重，被任为王室卿士，主持周室中枢大政。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腹心，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使其国势蒸蒸日上，在诸侯中的影响力迅速增大。庄公继位后，首先平定了公叔段的叛乱，稳定了内部；接着又侵伐邻

近诸侯，扩充自己的领地，导致出现了所谓的“小霸”局面。随着政治、军事实力的增强，郑庄公对周室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桀骜不驯了，周、郑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面对郑国的强盛，周王朝开始感到不安了。早在周平王时，就开始考虑削弱郑国的问题。平王为分散郑庄公的权力，曾打算任命虢公林父为卿士，结果做事不密，为郑庄公侦知，并当面质问。后来，便发生了互派长子作人质的事件，史称“周郑交质”。周平王的长子姬孤最终便客死郑国。

周平王五十一年（公元前 720 年），平王去世，嫡长孙姬林继位，是为周桓王。桓王因父亲客死郑国而深恨庄公的专横跋扈，再加上年轻气盛，缺乏政治经验，上台伊始，便开始考虑打击郑庄公。周桓王五年（公元前 715 年），他任命虢公林父为右卿士，使之与作为左卿士的郑庄公分庭抗礼；八年（公元前 712年），又强行向郑国索取了邬、刘、苏、刊四邑，而将本不属周王的十二邑作为交换条件，实质上等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这两件事令庄公十分愤怒，但他毕竟老谋深算，还是强压怒火，忍耐下去了。然而，周桓王却错误地把庄公的忍让看作软弱可欺，于是更进一步，于十三年（公元前 707 年）剥夺了他的卿士职位，从而把郑庄公逼上了绝路。庄公大怒之下，从此便不再朝觐周天子。

周桓王无法忍受庄公这种无礼抗上的行为，于是便于当年秋天，亲率周、陈、蔡、卫联军开赴郑国，大举征伐。郑庄公忍无可忍，决策反击。双方在繻葛（今河南长葛东北）摆开了战场。为了赢得作战胜利，双方都进行了严密的部署。桓王将周联军分成三军，令卿士周公黑肩指挥左军，陈军附于其内；令卿士虢公林父指挥右军，蔡、卫军附于其内；桓王自己统率中军主力。针对周联军的布置情况，同时也鉴于陈、蔡、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